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凤阳花鼓全书

史论卷

上

凤阳花鼓全书
编纂委员会
编纂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凤阳花鼓全书

史论卷 ①

凤阳花鼓全书编纂委员会

编纂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本书获财政部、文化部2011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保护资金资助
凤阳县人民政府专项资金资助

本书合作单位

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
滁州学院音乐学院
安徽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凤阳花鼓全书》编纂指导委员会

名誉主任:吴庭美 张 勇 唐 跃 赵国华 王 强

主 任:米德成

副 主 任:徐广友 钱家广

委 员:仲卫东 汪国玲 陈开广 王兴德 陈永庆 高有才 王胜勤

《凤阳花鼓全书》编纂出版委员会

顾 问:张媛媛 黄先有 杨成志 王俊山 吴守荣 张乡远 方乐平

何开春

主 任:吴庭美

副主任:陈本田 王从权 宋同庆

委 员:姚广德 王启虎 曹启兵 赵宏江 蒋保斌 胡正学 张亚洲

张雅丽 刘汉寿 姚夕成

《凤阳花鼓全书》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振忠	王耀华	方 宁	冯双白	朱继胜	刘 楨	刘文峰	刘彦君
江明惇	孙凤城	李新风	杨 春	时白林	吴文科	沈 梅	张 刚
张海英	欧建平	罗 斌	周育德	项 阳	柯文辉	俞 冰	秦华生
贾志刚	唐先田	廖 奔					

《风阳花鼓全书》编纂委员会

主 编:夏玉润

副主编:高寿仙 刘思祥 周熙婷

编 委:夏玉润 高寿仙 刘思祥 陈传万 方志新 李道琳 鲍 伟
陈仁华 徐 茵 石 松 苏兆龙 周熙婷 刘汉寿 陈传吉
王志勇 王春红 王俊花 毛景娴 石 莉 芮凤阁 李 慧
吴瑞卿 单 蕾 宫楚涵 徐 川 蔡雨燕 裴旖旎

《风阳花鼓全书》(史论卷)

夏玉润 著

前 言

(代总序)

2010年上半年,凤阳县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简称“老科协”)成立后,为实现老有所为的愿望,拟对凤阳花鼓进行挖掘、整理、宣传。最初的打算是请王文福同志牵头,把凤阳“双条鼓”开发出来,作为旅游产品宣传、推销;请夏玉润同志写一本小册子,作为“凤阳花鼓”文字介绍材料。“老科协”会长陈本田同志邀请我来协调此项工作。我生在凤阳,又在凤阳工作多年,退休后又客居凤阳,对于这种要求我也没有理由推辞。但对凤阳花鼓早有研究的夏玉润同志,接受任务后一再坚持:一本小册子不能说清楚凤阳花鼓的全貌,提出要编写一部较完整的《凤阳花鼓全书》。夏玉润同志这种想干事、想把事情干好的精神,我们没有理由不支持。

我们把编写《凤阳花鼓全书》的想法报告给凤阳县委。时任凤阳县委书记张勇同志听取汇报后,立即批示同意老科协的方案。为了慎重起见,我们于2010年12月4日召开了《凤阳花鼓全书》论证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文化部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吴文科,中国戏曲学院原院长周育德,中国戏曲音乐学会名誉会长时白林,安徽省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朱继胜,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唐先田,安徽省文化产业发展促进会常务副秘书长高敏,黄山书社总编赵国华,编辑室主任石松,安徽省文化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张媛媛等以及凤阳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

会上,与会领导、专家学者从历史、地域、民俗角度,从戏曲、音乐、舞蹈、文学、绘画等领域对凤阳花鼓进行广泛探讨。一致认为,凤阳花鼓,作为全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历史悠久,具有南北交融的移民文化和凤阳帝乡文化的特色,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对其保护、挖掘、整理和传承意义重大。建议凤阳县人民政府和文化部门将《凤阳花鼓全书》列入“十二五”文化工程,积极向国家、省和出版部门争取项目资金。这次论证会,对《凤阳花鼓全书》的编纂出版取得高度认同,论证会后获得国家专项资金50万元。可以这样说,没有这次论证会就没有我们的决心,更谈不上《凤阳花鼓全书》的出版。

《凤阳花鼓全书》原定2012年底出版发行,延至2015年底出版的原因很多:一是征集资料难度很大。凤阳花鼓流传几百年,流传国内外。为了全面、完整、系统的编写《凤阳花鼓全书》,必须进行资料征集工作。从2011年4月份开始,夏玉润同志在各方面领导、专家的引荐和帮助下,先后前往山西、河南、云南、广西、湖南、广东、江西、福建、浙江等地进行采访收集资料。三次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查阅资料,并与该馆洽谈资料合作事宜。特别是国外资料的征集,不但渠道难通,而且手续也很繁杂。征集来的资料还要找人翻译,费时费力。二是编纂工作任务重。据初步统计,《凤阳花鼓全书》征集的资料,除音像、图片外,仅文字部分就有千万字以上。要把这些资料归类、整理、筛选、打印、校对,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除夏玉润、高寿仙、刘思祥、周熙婷同志外,我们还请了安徽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滁州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音乐学院,滁州艺术学校部分领导、教授、老师参与此项工作。三是协调工作量大且繁。参加《凤阳花鼓全书》领导、编辑、服务工作的,由凤阳县成立了领导小组、工作小组。还有县外参与的诸多单位和个人。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由没有多少公权的“老科协”和我一个已经退休的同志来组织协调,实在很难。很多工作要做到步调一致、雷厉风行根本不可能,只能采取磨杵成针、趋势而行。《凤阳花鼓全书》从立项到成书,召开的各种协调会、工作会40余次,很多时间流逝在协调中,很无奈也很自然,也可以说是好事多磨。

《凤阳花鼓全书》自立项到成书,历时五年。其间更换两任县委书记,两任县长,三任宣传部长,四任县政府分管领导。领导换了一次又一次,但重视和支持《凤阳花鼓全书》的编纂工作力度始终未变。为了领导推动编纂工作,县委成立了《凤阳花鼓全书》编纂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工作小组。当时的县委书记张勇同志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时任县长米德成同志任副组长并批专项经费,确保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并把《凤阳花鼓全书》列入“十二五”文化工程之一;下文明确提出:此项工程由县委宣传部负责,文广新局、老科协、财政局协办,并责成时任宣传部长钱家广同志代表县委负责此项工作。这种领导格

局,五年来并没有因为人员变动而受到影响。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凤阳县委一贯重视和支持,不可能有《凤阳花鼓全书》的出版。

《凤阳花鼓全书》编纂期间,夏玉润同志不分春夏秋冬,不管暑热严寒,奔赴全国各地收集资料,协调其他编纂人员和单位,这种不辞劳苦、勤奋奉献的精神应当充分肯定。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为《凤阳花鼓全书》服务和工作的其他同志。据初步统计,参与《凤阳花鼓全书》编纂和服务工作的仅在册的就有88人,其中领导小组27人,办公室工作人员9人,编纂人员12人,学术指导27人,资料合作13人。加上安徽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滁州学院音乐学院部分学生以及参加录音录像工作的凤阳花鼓民间艺人、音像采编人员、文化馆站业务工作人员等,总共约有200人左右。参与《凤阳花鼓全书》的上述人员,有的在书中留名,有的没有留名。无论留名和没有留名的,只要为《凤阳花鼓全书》出版做过贡献的都应当给予肯定和点赞。《凤阳花鼓全书》是不是精品不敢说,但完全可以说它是团结合作的产物,是无私奉献的产物。

《凤阳花鼓全书》原定出版五卷。2015年出版《文论卷》(上下册)《文献卷》《文集卷》《词曲卷》等四卷。《音像卷》由于时间和技术原因,今年无法出版。但《音像卷》所有资料已基本征集完成。我们相信,凤阳县委、县政府会一如既往地重视和支持,善始善终把此项工作做圆满。

吴庭美

作者曾任凤阳县委书记,现任《凤阳花鼓全书》领导小组顾问、办公室主任

序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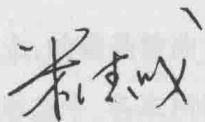
凤阳古称钟离国,秦汉置钟离县,东晋升钟离郡,隋、唐、宋、元称濠州,明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赐名凤阳,历明、清两代,至新中国成立,迄今已有两千八百余年历史,可谓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物华天宝,享有“帝王之乡、改革之乡、花鼓之乡、石英之乡”的美誉。遍览神州,凡海内两千余县,冠此诸多美誉者,实属麟角。然“四乡”之中,又以凤阳花鼓最富地方特色、传奇色彩。

凤阳花鼓大约产生于明正统年间(1436~1449年),至今约有近600年的历史,她是中华民族民间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是淮河流域文化艺术的典型代表,是凤阳帝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55年,新中国第一代花鼓女曾到北京怀仁堂演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观看了凤阳花鼓。2006年5月20日,凤阳花鼓被列入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6月10日,凤阳花鼓的音乐——凤阳民歌,被列入我国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凤阳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对凤阳花鼓、凤阳民歌这一充满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传统艺术进行保护与传承,使得这一古老的地方民间艺术奇葩,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遗憾的是,对于这一驰名中外的民间艺术瑰宝,目前却没有一部全面系统且专业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专著。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几位退休老同志带着浓浓的感情和深深的爱意,不辞辛劳,不计薪酬,倾注心血,历经五载,终向凤阳人民交上了一份450万字的满意答卷,这必将为凤阳文化的瑰丽长卷再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于凤阳民间艺术之留存及发展善莫大焉。

文化建设可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经济发展又能反哺文化建设。只要更多的发掘、保护、传承、发展好凤阳花鼓这样的文化遗产,必将能为凤阳社会经济的发提供不竭动力。

一番浅识,是为序。



作者系中共凤阳县委书记

序 二

2015年11月25日,夏玉润先生发来电子邮件告诉我,由中共安徽省凤阳县委员会和凤阳县人民政府组织编纂的包括了“史论卷”、“文献卷”、“文集卷”、“词曲卷”、“音像卷”共五卷近500万言的《凤阳花鼓全书》,经过5年时间紧张而又艰苦的努力,除“音像卷”因形制特殊容后出版外,其他四卷基本告竣,即将付梓。并嘱我为他承担撰写的《凤阳花鼓全书》(史论卷)作序。

坦率地说,收到这样的信息,首先令人感奋!一方面,凤阳地方党委和政府能够组织实施这样一个具有多重价值的文化建设工程,意义自不待言;另一方面,“凤阳花鼓”作为具有凤阳地方特色与独门品牌效应的文化事象,长期以来,不仅对凤阳本地的艺术乃至文化发展作用重大,而且对全国其他地方以至海外的艺术文化发展,也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凤阳花鼓”进行文化意义上的全面梳理和整体研究,不仅是对凤阳当地艺术文化持续发展的智力投资,更是对具全国乃至世界影响的“凤阳花鼓”及其文化流播宽远踪迹的一种学术礼敬和文献集存。

同时,有关作序的嘱咐,又着实令我为难!特别是在收到已经排好版的书稿清样并进行浏览之后,这种为难的感觉,甚至可以说是转换为畏难了。这是由于,在我的学术视野 and 知识背景中,凤阳花鼓基本上或者说主要是作为曲艺的一个品种来看待 and 理解的。也就是说,站在现时代学术及其学科化立场的角度去看,尽管其与通常被作为音乐理解的“凤阳歌”(声乐民歌)和“凤阳锣鼓”(器乐演奏)、作为舞蹈理解的“花鼓灯”、作为戏曲理解的“花鼓戏(‘卫调’)”和主要作为歌舞理解的“双条鼓”等等不同的概念名称与表演样式之间,有着这样那样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现时代艺术门类化发展的知识体系构建过程中,像本书即《凤阳花鼓全书》(史论卷)所标示或指称的“凤阳花鼓”概念,的确是被曲艺、音乐、舞蹈、歌舞和戏曲等等艺术门类,在各自不同的发展向度和稳定形态中,各取所需、分化独立而固化单列了。现在,《凤阳花鼓全书》(史论卷)又将其作为一个互为关联的整

体性艺术事象,统合起来进行虽有不同角度的解析却更多是属关联意义上的考辨性阐释研究,于我来说,就不是一件有充分资格而可以随便发言的事情。因而,便很恳切地想推脱这一要求。

然而,夏玉润先生以70高龄的年纪,于2016年元旦刚过的1月4日,专程来到北京,并于次日赶到我的办公室里,“横刀立马”地以老朋友身份,硬是当面要求我“一定要为本书在前面写一点文字”。面对他的这种诚恳与执着,我虽表示学力有限实难胜任,直言慨叹“面对大作,如‘老虎吃天’,有‘无处下爪’之感”,但在他的一再坚执乃至“哪怕是一千字也可以”的催迫之下,只能“赶鸭子上架”,“恭敬不如从命”了。

正如我们从本书所看到的那样,作为一种历史意涵丰富且互有形态关联的艺术事象,“凤阳花鼓”堪称一座蜿蜒逶迤的文化山峦。借用宋人苏轼的著名诗句来说,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好比“岭”与“峰”虽有内在的关联,但却毕竟属于不同的地貌“形态”一样,“凤阳花鼓”在不同发展时期和流布地域所拥有的不同表现样式,以及各自禀赋的文化意涵,也因各不相同的表现形态而具有各自相应的认知“标准”。因此,过去相当一个时期以来,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各自的观察视角和研究目的出发,分别对之进行了各自学科暨艺术门类意义上的不同考察。其间尽管不乏“坐井观天”的“局限”与“盲人摸象”的“偏颇”,但确实不同的发展向度和学科视野里,给予“凤阳花鼓”较为“专精”和“深入”的学术观照与理论开掘,并在很大意义上促进了源自“凤阳花鼓”又沿着各自不同的形态路径独立发展的“自身提升”。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对于“凤阳花鼓”在诸如音乐、舞蹈、歌舞、曲艺、戏曲等艺术形态的门类化“分流繁衍”现象和“分化独立”结果所作的学科划分与学术探讨,无疑具有自身必然的历史逻辑。既是对于作为整体性艺术文化事象的“凤阳花鼓”及其发展流变的学术回应,也是对已然从“凤阳花鼓”中分流演化而来,即分别独立而为曲艺、音乐、舞蹈、戏曲和歌舞,即现在学界多数人通常习称之的“花鼓小锣”或“凤阳花鼓”、“凤阳歌”及“凤阳锣鼓”、“花鼓灯”、“卫调”或“花鼓戏”等不同艺术形态独有特征的阐释与认定。某种意义上说,也可谓“学科与门类立场决定取舍与研究的眼光,形态及审美特征框范审视与衡量的标准”。对此,我于2006年9月14~16日应邀参加在凤阳举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凤阳花鼓全国学术研讨会”时,提交宣读并被收入本书系即《凤阳花鼓全书》(文集卷)中的那篇题为《凤阳花鼓的艺术属性与文化特质——兼谈凤阳花鼓的传承与保护》的论文,已经较为明晰地表达了我的一些相关认识。尽管时间过去了已经整整10年,重新翻检,感觉围绕论题的基本理解与阐释依然未变。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参照着看看。唯一需要强调的是,那篇文章有关凤阳花鼓及

其艺术属性与文化特质的论述,是站在现时代立场上、的一个相对“静态”的共时性“横截面”阐释,非为“动态”的历时性“纵截面”剖析。

走笔至此,也便切入到了《凤阳花鼓全书》(史论卷)的研究视角及学术特色。正如本书“绪论”的第三节第“二”目开宗明义所说的:本书对于“凤阳花鼓”的论述,“遵循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从历史学、历史地理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对凤阳花鼓所涉及的戏曲、曲艺、音乐、舞蹈、文学、美术、民俗、宗教等领域进行研究”并“力求完美”。读过书稿,不难发现,作者的研究目的,是基本达到了的。尽管对于所列学科范畴的涉猎与论述,由于资料文献的多寡和学术操作方式的异同,而在详略深浅上不尽均衡,但在“跳出三界”看问题和“打通壁垒”找根由的“互动”与“互证”中,的确超越了某种“坐井观天”和“盲人摸象”式的立场局限。所进行的实际上是属于“跨学科”性的整体与关联研究,与通常所见更多是属于“分学科”式的研究有所不同。也由于此等品格,同时又具有了一些“去学科”的圆融与超脱。再加上史料文献比较丰赡,尤其是许多由田野调查得来的第一手资料的鲜活支撑,使得其对“凤阳花鼓”的历史考察与文化阐释,包括艺术形态的关联性描述和发展流变解析,以及传播影响的文献钩沉与效能估价等等,都拥有了自己“一家之言”的特质与价值,值得读者去仔细披览并对比研判。

当然,比照本书对于“凤阳花鼓”作为一种艺术文化事象的整体性研究主要是基于“历时性”的源流考辨与分角度阐释,过去那些更多是对“凤阳花鼓”在曲艺、音乐、舞蹈、歌舞和戏曲等门类意义上的“分学科”研究,尽管也有各自视野的“历时性”历史考察,但主要即更多的是在“共时性”的意义上各自展开。其间,一个最为麻烦而又纠结的问题,就是“名实之辨”。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正如我们在本书中随处可见的有关“凤阳花鼓”的诸多名目所呈示出的,迄今有关“凤阳花鼓”的艺术事象,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空间地域,包括不同文化语境和使用习惯,以及艺术门类和学科视野中,表述都会有所不同。全称、别称、简称、略称、俗称、习称甚至讹称等等,不一而足。即使是在同一学科或门类意义上,也常常存在着形式(类属)与内容(节目)、曲调与曲目等等的笼统指称与含混表达问题。就连一些本该很有权威性的文献典籍与工具书,也难免五花八门、相互抵牾,甚至莫衷一是。只在少数训练有素的学者笔下,才会至少先行厘定,而后再行讨论。否则,常常是自说自话,各行其是,以至“以其昏昏”,“使人糊涂”。《凤阳花鼓全书》(史论卷)尽管在行文中也会由于自身的表述习惯和转引转述而难免让读者眼花缭乱有些吃力,但比较可贵的是,对那些主要的概念与范畴,均能在相应的地方,进行及时的说明与厘定。比如:在“绪论”第二节下的“一”目中,对于“‘凤阳花鼓’的界定”是:“本书所说的‘凤阳花鼓’,

与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凤阳花鼓’的概念并非一致,它是一种全方位、大概念的艺术,是沿袭明清以来中国乃至全世界对凤阳花鼓不同释义的集合”;再如:第五章第二节起始对“花鼓灯”的界定:“是集歌、舞、曲艺、戏曲为一体的综合性表演艺术形式”;又如:第六章一开头这样界定“凤阳歌”:“凤阳花鼓的音乐、曲目,本文称‘凤阳歌’”。且不论这些界定在逻辑上是否完全周延(如对“凤阳歌”的界定,将“音乐”和“曲目”并列使用,就显得有些含混:特别是联系到前述对于“凤阳花鼓”的厘定,则原本比较抽象和概括的“音乐”概念,在这里变得更加庞杂;而将特指音乐节目名称的“曲目”概念与之相提并论,也确不在一个逻辑层面),但至少能够自我厘定,自成一言,从而极大地减少了阅读和理解的困难。

总之,《凤阳花鼓全书》(史论卷)的学术特色比较鲜明,内容蕴含丰满厚重,值得读者朋友去细细品味,慢慢分享。前述对于本书的粗略认识和肤浅感受不一定都很确当,对读者诸君的开卷阅读也不一定能有助益,但至少在态度上,已然达到并超过了夏玉润先生“哪怕是一千字也可以”的劝勉与要求。至于本书真正丰富而又实在的价值与意义,相信高明的读者朋友一定会有各自的收获与评判,我在这里就不多做絮叨了。

是为序。

吴文科

2016年1月15日夜于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序 三

《凤阳花鼓全书》是凤阳县委、县政府举本地区文化精英全力编纂的一部巨著。全书分史论卷、词曲卷、文献卷、文集卷、音像卷，仅文字就达400多万字，不仅全面记述了凤阳花鼓的历史和现状，而且通过凤阳花鼓产生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反映了凤阳这一历史上的帝王之乡在明、清、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经济、文化发生的巨变，以及对其他区域文化的影响，不仅为凤阳文化建设提供了历史的借鉴，而且对全国各地做好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提供了一个范例，意义重大。

笔者应邀参加了《凤阳花鼓全书》的初审工作。读了这部巨著以后，觉着编撰者在资料的搜集上下了很大的工夫，做到了广、深、细、全。凡涉及凤阳花鼓的资料，无论古、今、中、外，词曲、剧本、游记、奏章，文字、图片、音响、影像，均囊括其中，应有尽有。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幸运的是凤阳县的领导把凤阳花鼓作为本地的文化品牌来打造，在人力、物力上给予大力支持，十分难得；更令人感动的是本书主编夏玉润先生不辞辛苦，广泛求索，调查阅读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的公共图书馆、文化科研单位的资料馆，乃至海外的收藏。除了自己付出，还动员子女、亲朋好友帮助。夏玉润先生已经退休多年，年已古稀，如果没有对家乡的赤子之心和对传统文化的敬重是做不到的。

其二，全书史论结合，结构严密，观点鲜明，重点突出。《凤阳花鼓全书》是一部集资料性、学术性为一体的巨著。文献卷、文集卷、词曲卷、音像卷是按所搜集的资料内容编排的，而史论卷则是夏玉润先生在掌握了丰富的资料并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研究以后撰写出来的，结构严谨。在此卷中，作者首先记述了凤阳花鼓产生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背景。这一点很重要。说起凤阳花鼓，开头的四句唱词给人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这四句唱词道出了凤阳花鼓产生的社会背景，但在未看此书之前，只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一个本来是适合农耕生产、人类居住的好地方，如何变成了土地荒芜，人民背井离乡的荒凉之地？作者通过详实的史料和深入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十羊九牧”，即深重的政治压迫、经济盘剥。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原本想给家乡的父老乡亲做好事，把凤阳建成人丁兴旺、政治稳固、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帝王之乡，不料庞大的官僚机构、贪得无厌的贵

族集团、沉重的经济负担、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使凤阳成为民不聊生的重灾区。洪武初年来自南北各地的移民把各地的文化艺术带到凤阳,到明中叶,凤阳人民难以在当地生存,把凤阳民间歌舞作为游走他乡谋生的手段。作者以大量生动的历史资料揭示了凤阳花鼓产生的社会原因。凤阳花鼓之所以能流传全国,也是因为其有移民文化基因这一广泛的群众基础。

其三,丰富了“凤阳花鼓”的内涵。在一般读者看来,凤阳花鼓不就是一种淮北地区流行的民间歌舞吗?通过作者的大量调查研究,认为“凤阳花鼓”绝不仅仅是一种民间歌舞,而是一种包括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戏曲、民间曲艺在内的并影响到民间美术等众多艺术领域的文化现象。作者分门别类地论述了凤阳花鼓与各种民间艺术的关系,并着重阐述了凤阳花鼓与戏曲的关系,如与各地花鼓戏、花灯戏、秧歌戏、采茶戏、滩簧戏等民间戏曲的关系。不仅如此,在地方大戏中亦有凤阳花鼓的种子,昆曲、京剧、梆子戏中均有《打花鼓》这一以凤阳花鼓为曲调的小戏。作者认为,凤阳花鼓之所以和地方戏关系如此密切,是因为它在清代宫廷上元灯会上演出,从而产生巨大影响的结果。这一结论有待进一步研究。中国民间曲艺或民间歌舞发展成戏曲形式,均经历了两小戏到三小戏然后发展到大戏的过程。而且在现存的三百多种地方戏中,小戏、大戏、雅部、花部并存,并仍然有一些地方的民间歌舞、曲艺在向戏曲形式演进。但作者的这种研究和思路是有意义的,特别是为与凤阳花鼓关系比较密切的花鼓戏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戏曲发展规律有一定启迪。

作者在总结“凤阳花鼓”形成的社会原因时说“贫穷”造就了“凤阳花鼓”。20世纪80年代以后,凤阳人民走向了富裕之路,凤阳花鼓生存发展的这一社会条件没有了,但并不意味其没有社会存在价值了。因为在“凤阳花鼓”中饱含着凤阳人乃至江淮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和文化基因。虽然凤阳花鼓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传承发展依然面临种种困难。这是作者担忧的,也是读者在看完这部巨著以后关心的。为凤阳花鼓的传承保护提供历史的借鉴和理论支持是本书编撰出版的目的之一,但真正做到凤阳花鼓的传承发展更重要的是当地政府在政策和人力物力上的具体支持和当地文化工作者的实践。希望在各界的努力下,凤阳花鼓得到传承发展,在新的社会生活中继续发挥其文化娱乐功能!

刘文峰

2015年12月20日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博士生导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